

主编／金冠军 戴元光

中国传播思想史

古代卷（上）

余志鸿／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主编 金冠军 戴元光

中国传播思想史

古代卷(下)

本卷著者 余志鸿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隋代的传播思想	1
第一节 隋王朝的传播事业和传播活动	1
第二节 颜之推的传播思想	6
第三节 陆法言的传播思想	22
第四节 王通《中说》的传播思想	27
第二章 唐五代传播思想	33
第一节 《贞观政要》及其传播思想	33
第二节 科举制和唐代的教育传播	44
第三节 唐代的传播家及其传播思想	50
第四节 唐五代的传播事业及其传播思想	66
第三章 两宋时期的传播思想	81
第一节 《资治通鉴》的史学传播思想	82
第二节 北宋理学的传播思想	97
第三节 南宋理学的传播思想	116
第四节 两宋传播行为的性质和特征	138
第四章 蒙元时期的传播思想	151
第一节 元儒和帝王的传播思想	151
第二节 蒙元多元宗教的传播思想	171
第三节 元帝国的文学艺术传播	186
第五章 明代的传播思想	205
第一节 传播体制和王权传播思想	205

第二节	长篇小说出现和文学传播	218
第三节	王守仁的“心学”及传播思想	233
第四节	《菜根谭》的传播思想	250
第五节	明代书院及其传播思想	265
第六章	清王朝初中叶的传播思想	277
第一节	帝王的政治文化传播思想	277
第二节	清初代表学者的传播思想	294
第三节	发达的小学及其传播思想	310
第四节	清代文学的传播思想	326
主要参考文献		345

第一章

隋代的传播思想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时期,隋代传播思想的风貌有了很大的变化。隋文帝成为中国第二个完成统一大业的皇帝。但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里程上,隋代又是一个与秦王朝一样短命的二世王朝,只有 38 年的历史。隋炀帝时期发生了几件有利于物质传播的重大事件:一是扩建洛阳(后改称“东都”);二是修建大运河,即开通济渠(洛阳到淮安运河)和邗渠(淮安到长江运河);三是从洛阳乘龙舟出游江都,三次下江南;四是凿太行山娘子关险隘,开太原到华北御道;五是发兵高丽,三次东征。在政治传播和思想传播上,推行儒学,开创广泛吸纳知识分子从政的科举制度,为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人才选拔方式提供了一个蓝本。在语言传播上,适应国家统一的需要和改善社会交际环境,组织专家进行全国规模的语音规范探讨,诞生了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的韵书《切韵》。

第一节 隋王朝的传播事业与传播活动

一、各民族沟通的传播思想

隋开国皇帝杨坚使分裂的中国重归于统一。隋是承前启后的一个朝代,文帝与炀帝共在位 38 年。在这 38 年中,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

方面均有所巩固和发展。首先在政治方面,隋朝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统治机构,恢复了被废除多年的三师、三公、九卿的旧制。确立了三省、六部新制,增强了中央集权统治。通过制定《隋律》稳定了社会秩序。在经济方面,文帝下令整顿户籍,清查人口,继而推行均田制,调整赋役。与此同时,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和加强漕运力量,开渠引渭水直达潼关。后炀帝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又开“永济渠”引沁水南通黄河,自辉县至涿郡,长达两千余里,这就是现在所谓的京杭大运河。另外,由于隋朝以前连年的战乱,各朝没有统一的币制和度量衡,这极大地影响了市场商品的交易与流通。因此,隋朝建立以后首先宣布禁用旧钱,统一发行合乎规格的“五铢钱”,严惩私铸钱币。同时,还规定了标准的铜斗铁尺,颁行全国。这样一来,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创造了良好条件。在外交军事上,隋王朝一方面全力开发边疆,另一方面努力发展周边国家的关系。

当时对杂居的北方民族统称为“突厥”。在隋文帝时期,不仅与突厥各部落发生了密切联系,还与拜占庭建立了来往。隋炀帝时,先是离间北方突厥各部落,后将宗女安乐公主嫁给东突厥可汗启民。隋炀帝四年(公元608年)声势浩大地巡游榆林,到启民可汗的王庭。当时启民可汗已击败对手,推进到黄河北岸,成为突厥族的大可汗。启民可汗上表说:“……臣今非是旧日边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至尊怜臣,时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臣今率部落敢以上闻,伏愿天慈不违所请。”^①要求改变风俗,以加速汉化。但是,隋炀帝认为这样做不行,他说:

先王建国,夷夏殊风。君子教民,不求变俗。断发文身,咸安其性;旃裘卉服,各尚所宜。因而利之,其道弘矣,何必化诸?削衽縻以长纓,岂逐性之至理?非包含之远度。衣服不同,既辨要荒之叙,庶类区别,弥见天地之情!^②

隋炀帝虽然在历史上被称为暴君,但他是个十分聪明和有才智的君王,非常懂得传播符号的标志功能,所以他对启民说:“但使好心孝顺,何必改衣服也!”因为衣服和风俗的不同,既可以在形式上区别民族和文化的差异,又可以保持民族文化上距离,从而使各民族安守于自己的地位。“君子教民,不求变俗”的主张,是很高明的传播思想。在他收服西突厥时,又打比方向西突厥可汗宣传统一的道理,说:“譬如天上,止有一个日照临,莫不宁帖。若有两

① 隋书·北狄列传·突厥

② 隋书·北狄列传·突厥

个、三个日,万物何以得安?’又将信义公主嫁给他,于是西突厥心悦诚服地尊隋炀帝为大可汗。

二、与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传播思想

当时朝鲜半岛一分为三:高丽、百济、新罗。高丽与隋一江之隔,隋炀帝曾三次东征,虽然以失利告终,但也发展了对外关系。大业八年(公元612年)隋炀帝亲征,发表了长篇宣言,充分展示他的宣传能力,他说:

天地大德,降繁霜于秋令;圣哲至仁,著甲兵于刑典。故知造化之有肃杀,义在无私;帝王之用干戈,盖非获已。版泉、丹浦,莫匪龚行,取乱覆昏,咸由顺动。况乎甘野誓师,夏开承大禹之业;商郊问罪,周发成文王之志。永监前载,属当朕躬。粤我有隋,诞膺灵命,兼三才而建极,一六合而为家。提封所渐,细柳、盘桃之外,声教爰暨,紫舌、黄枝之域,远至迤安,罔不和会。功成治定,于是乎在。而高丽小丑,迷昏不恭,崇聚勃碣之间,荐食辽獫之境。虽复汉魏诛戮,巢窟暂倾,乱离多阻,种落还集。萃川藪于往代,播实繁以迄今,眷彼华壤,剪为夷类。历年永久,恶稔既盈,天道祸淫,亡征已兆。乱常败德,非可胜图,掩愆怀奸,唯日不足。移告之严,未尝面受,朝覲之礼,莫肯躬亲。诱纳亡叛,不知纪极,充斥边垂,亟劳烽候,关柝以之不静,生人为之废业。在昔薄伐,已漏天网,既缓前擒之戮,未即后服之诛。曾不怀恩,翻为长恶,乃兼契丹之党,虔刘海戎,习鞬鞬之服,侵轶辽西。又青丘之表,咸修职贡,碧海之滨,同稟正朔,遂复夺攘琛黻,遏绝往来,虐及弗辜,诚而遇祸。輶轩奉使,爰暨海东,旌节所次,途经籓境,而拥塞道路,拒绝王人,无事君之心,岂为臣之礼!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且法令苛酷,赋敛繁重,强臣豪族,咸执国钧,朋党比周,以之成俗,贿货如市,冤枉莫申。重以仍岁灾凶,比屋饥谨,兵戈不息,徭役无期,力竭转输,身填沟壑。百姓愁苦,爰谁适从?境内哀惶,不胜其弊。回首面内,各怀性命之图,黄发稚齿,咸兴酷毒之叹。省俗观风,爰屈幽朔,吊人问罪,无俟再驾。于是亲总六师,用申九伐,拯厥阡危,协从天意,殄兹逋秽,克嗣先谟。今宜援律启行,分麾屈路,掩勃解而雷震,历夫余以电扫。比戈按甲,誓旅而后行,三令五申,必胜而后战。……凡此众军,先奉庙略,骆驿引途,总集平壤。莫非如豺如貔之勇,百战百胜之雄,顾眄则山岳倾

颓，叱咤则风云腾郁，心德攸同，爪牙斯在。朕躬驭元戎，为其节度，涉辽而东，循海之右，解倒悬于遐裔，问疾苦于遗黎。其外轻赉游阙，随机赴响，卷甲衔枚，出其不意。又沧海道军舟舳千里，高帆电逝，巨舰云飞，横断涓江，迳造平壤，岛屿之望斯绝，坎井之路已穷。其余被发左衽之人，控弦待发，微卢彭濮之旅，不谋同辞。杖顺临逆，人百其勇，以此众战，势等摧枯。然则王者之师，义存止杀，圣人之教，必也胜残。天罚有罪，本在元恶，人之多僻，胁从罔治。若高元泥首辕门，自归司寇，即宜解缚焚桎，弘之以恩。其余臣人归朝奉顺，咸加慰抚，各安生业，随才任用，无隔夷夏。营垒所次，务在整肃，刍蕘有禁，秋毫勿犯，布以恩宥，喻以祸福。若其同恶相济，抗拒官军，国有常刑，俾无遗类。明加晓示，称朕意焉。^①

他表示这次战争不是为了好大喜功、炫耀个人，而是为了吊民伐罪。他反复控告高丽国王的罪恶，强调申讨的理由。在作出军事部署后，又告诫军人不得奇兵突袭、邀功取赏，自己既然是正义之师，一定能战胜对方，所以不要任意杀人和残害百姓，对敌人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隋炀帝杨广深知战争是外交的继续，懂得战争传播只是政治传播的一部分，因此这番话与其说是训诫自己的军队，不如说是故意说给敌人听的。只是漂亮的宣言没有换来战争的胜利，而连年的战事，又对人民大施徭役，致使民不聊生，终于使政权毁于一旦。

隋的对外政策对日本也有很深的影响。日本四次派出遣隋使，据史书记：

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明年，上遣文林郎裴清使于倭国。……倭王遣小德阿辈台，从数百人，设仪仗，鸣鼓角来迎。^②

不仅向日本传播了佛法，同时也传播了中国古代文化，以致日本飞鸟时期实施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推古改革。

隋代专门设立了翻译佛经的“番经馆”，还通过越南的林邑获得梵文佛典1350多部，丰富番经馆的藏书，推进了翻译佛经的校勘工作，并编成了《众经目录》。另外，打通西域丝绸之路，传入了天竺乐。在短短30余年中，隋王朝恢复了几个世纪以来因割据纷乱几乎中断的对外关系。通过“丝绸之路”的

① 隋书·炀帝纪下

② 隋书·东夷列传·倭国

商业往来,促进了中国与西亚的相互交流,为后世盛唐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三、开科举、行儒学的传播思想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隋朝的自然科学与人文艺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如著名天文学家刘焯制订的《皇极历》,他计算的岁差与现代计算出的准确值相差无几。而在工程建筑方面,最突出的成就莫过于河北赵县安济桥的兴建。这座由李春监造的石桥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一座“孔状拱桥”。他的兴建比欧洲同类建筑泰克河上的塞雷桥早了近 800 年。隋代的绘画、音乐、舞蹈等各方面也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代表人物,如画家展子虔和他的《游春图》等。随着对外关系的改善和交流的发展,当时的地理学也有了较大的发展。炀帝下令撰写的《区宇图志》共 1200 卷,是一部图文并茂的全国地理专著,在中国地理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与此同时,隋王朝恢复了科举制度,鼓励武将的子孙学习文化。隋文帝八年(588 年),杨坚写诏书指出建立封建秩序的重要性。他说:

往以吴越之野,群黎涂炭,干戈方用,积习未宁。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僚,澡身浴德,开通耳目,宜从兹始。丧乱已来,缅将十载,君无君德,臣失臣道,父有不慈,子有不孝,兄弟之情或薄,夫妇之义或违,长幼失序,尊卑错乱。朕为帝王,志存爱养,时有臻道,不敢宁息。内外职位,遐迩黎人,家家自修,人人克念,使不轨不法,荡然俱尽。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专行。禁卫九重之余,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军器,皆宜停罢。代路既夷,群方无事,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人间甲仗,悉皆除毁。有功之臣,降情文艺,家门子侄,各守一经,令海内翕然,高山仰止。京邑庠序,爰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未有灼然明经高第,此则教训不笃,考课未精,明勒所由,隆兹儒训。官府从宦,丘园素士,心迹相表,宽弘为念,勿为踟促,乖我皇猷。朕君临区宇,于兹九载,开直言之路,披不讳之心,形于颜色,劳于兴寝。自顷逞艺论功,昌言乃众,推诚切谏,其事甚疏。公卿士庶,非所望也,各启至诚,匡兹不逮。见善必进,有才必举,无或噤默,退有后言。颁告天下,咸悉此意。^①

^① 隋书·高祖纪下

由上文看,隋文帝的传播思想大致有以下几点:

(1) 注意到传播的畅通是政治开明的表现,所以他强调:“凡我臣僚,澡身浴德,开通耳目,宜从兹始。”“开直言之路,披不讳之心。”

(2) 还注意到传播的畅通是人才选拔的重要途径,他指示说:“见善必进,有才必举,无或噤默,退有后言。”

(3) 注意社会传播的要点是建立封建秩序,他分析了南北朝时期动乱的原因,提出要重新树立传统伦理制度,明确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的尊卑关系。

(4) 在教育传播方面,他崇尊儒家学说,要求“有功之臣,降情文艺,家门子侄,各守一经”;鼓励贵族子弟参加科举,以“隆兹儒训”。

隋炀帝刚接位时继承了他父亲的传播理念,也极力倡导学习和注重人才的选拔。他在大业元年,诏告天下说:

方今宇宙平一,文轨攸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诸在家及见入学,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经术,未愿进仕者,可依其艺业深浅,门廕高卑,虽未升朝,并量准给禄。庶夫恂恂善诱,不日成器,济济盈朝,何远之有!其国子等学,亦宜申明旧制,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①

特别指示“其国子等学,亦宜申明旧制,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但很快他便穷兵黩武,“不能怀以文德,遽动干戈。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怨,以怒兴师”。至此儒家学说“其风渐坠,以至灭亡”^②,见于史书记载的儒学之士仅仅 14 人,与唐宋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其中寥若晨星的几位学人,却为中国传播思想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二节 颜之推的传播思想

颜之推(531~595 年?),字介,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北),历仕梁、北齐、北周等朝,隋开皇中,太子召为学士,寻以疾终。他是我国南北朝至隋初

① 隋书·炀帝纪上

② 隋书·儒林传

中期最渊博的学者,对文字、音韵、训诂、校勘都有很深的造诣,著作很多,今仅存有《颜氏家训》、《还冤记》等书。《颜氏家训》成书于隋文帝期间,是一部有深远影响的传世之著。

一、颜之推的语言传播思想

《颜氏家训》20篇,《音辞》是其中之一,专为论述声韵而作,是我国涉及语言传播的重要文献。文中分析了当时的语音实际,指出由于长期的社会分裂造成南北语音的割裂,既不利于人际交往传播,也不利于社会文化传播,他说:“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他想以晋室南渡前的洛阳旧音作为标准音,实现在统一社会下的语言规范化。他说:

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而古语与今殊别,其间轻重清浊,犹未可晓;加以内言外言、急言徐言、读若之类,益使人疑。

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高贵乡公不解反语,以为怪异。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谕,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揔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云为品物,未考书记者,不敢辄名,汝曹所知也。

夫物体自有精麤,精麤谓之好恶;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谓之好恶。此音见于葛洪、徐邈。而河北学士读《尚书》云好生恶杀。是为一论物体,一就人情,殊不通矣。……古人云:“膏粱难整。”以其为骄奢自足,不能克励也。吾见王侯外戚,语多不正,亦由内染贱保傅,外无良师友故耳。^①

颜之推列引大量著作,以说明当时语音的杂乱,非常不利于社会传播。隋代前后出现了许多韵书,第一部韵书是魏李登的《声类》10卷,之后有晋吕

^① 颜氏家训集解.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静仿《声类》的《韵集》5卷。据《隋志》等文献中所记载,有李概《修续音韵决疑》和《音谱》、王延《文字音》、王该《五音韵》、释静洪《韵英》、周研《声韵》、周彦伦《四声切韵》、沈约《四声》、王斌《四声论》、张谅《四声韵林》、刘善经《四声指归》、夏侯咏《四声韵略》、杨休之《韵略》、杜台卿《韵略》、潘徽《韵纂》等,还有无名氏的《文章音韵》、《字书音同异》、《叙同音义》、《杂字音》、《音书考源》、《纂韵抄》等。这些韵书虽然都已经散失,但也足以证明当时的知识分子从文学创作需要的角度,或从社会教育传播的角度,对语音的统一非常重视。

颜之推首先指出,语言的变化与地域文化有关系,也与民族接触有关联,北方人和南方人生活的生态环境不同,北方“山川深厚”,故跟南方在语音上差别很大,而且北方汉语又受到鲜卑语的影响,往往杂有“夷虏”;南方则受到吴越语的影响,也往往被感染。接着指出,语言不仅是方音之间的问题,也是一个涉及语言意义的理解问题。如果不从语音上注意词语读音的区分,常常造成语义沟通的阻碍。例如读到《尚书》“好生恶杀”句,“好”与“恶”不同的读音有着不同的含义:一指“人心的去取”,是对客观事物的评价,那么“好生恶杀”应理解为喜欢宽恕,容人生存,厌恶杀戮;一指“物体自有精粗”,是客观事物本身的价值,应理解为好人就让他活下来,坏人就让他死去。由于读音的错误,就会造成对文献意义理解的错误。可见语音在思想传播中的重要性。颜之推还指出,当时社会上“语多不正”,甚至王侯外戚等贵族不能免,认为其原因在于自身轻视语言的学习,又由于缺乏高明的老师和规范语言的环境。颜之推在规范官话方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传播理论,并做了许多推动语言规范的实际工作。

自古以来南北之间已经出现方言的歧异,所谓“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楚,即指南方方言;夏,即指中原标准音。颜之推已经认识到方言的差异,实际上是语言的古今历史差异和时世风俗差异的反映。因此,他强调语言传播不能囿于古人训读,也不能妄自穿凿。他说:

甫者,男子之美称,古书多假借为父子;北人遂无一人呼为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号,须依字读耳。案:诸字书,焉者鸟名,或云语词,皆音于愆反。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训:若训何训安,当音于愆反,“于焉逍遥”,“于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之类是也;若送句及助词,当音矣愆反,“故称龙焉”,“故称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托始焉尔”,“晋、郑焉依”之类是也。江南至今行此分别,昭然易晓;而河北混同一音,虽依古读,不可行于今也。

江南学士读《左传》，口相传述，自为凡例，军自败曰败，打破人军曰败。诸记传未见补败反，徐仙民读《左传》，唯一处有此音，又不言自败、败人之别，此为穿凿耳。^①

“焉”作为语气词分为疑问语气词和句末语气词两种用法，按古读是两个不同的音。当时的南方方言里仍有读音上的区分，但当时的北方方言已没有读音上的区分。他指出，如果要求北方方言再依古读去区分肯定是行不通的。同时他又指出，有的学人拘于传统的训诂，往往不顾语音实际，妄自改变读音，如“败”有打败和使失败两种不同用法，于是有人就人为地把它分化为两个读音。他感慨地说：

此例甚广，必须考校。前世反语，又多不切，徐仙民《毛诗音》反骤为在遘，《左传音》切椽为徒缘，不可依信，亦为众矣。今之学士，语亦不正；古独何人，必应随其伪僻乎？^②

颜之推在语言传播方面，从语音的重要性还论及了语义、语用、修辞等问题。他在《名实》篇中说：

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容色姝丽，则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忘名者，体道合德，享鬼神之福佑，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惧荣观之不显，非所以让名也；窃名者，厚貌深奸，干浮华之虚构，非所以得名也。

人足所履，不过数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颠蹶于崖岸，拱把之梁，每沉溺于川谷者，何哉？为其旁无余地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诚之言，人未能信，至洁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声名，无余地也。吾每为人所毁，常以此自责。若能开方轨之路，广造舟之航，则仲由之言信，重于登坛之盟，赵主之降城，贤于折冲之将矣。

吾见世人，清名登而金贝入，信誉显而然诺亏，不知后之矛戟，毁前之干櫓也。虞子贱云：“诚于此者形于彼。”人之虚实真伪在乎心，无不见乎迹，但察之未熟耳。一为察之所鉴，巧伪不如拙诚，承之以羞大矣。^③

他把“名”与“实”的关系，比喻作“形”与“影”的关系。“形”指容貌，“影”是镜

① 颜氏家训·音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② 颜氏家训·音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③ 颜氏家训·名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中的影像；外貌美丽，镜子里的影像也一定美丽。因此，他认为“充实”比“汲名”重要，一个人自身不注意修身养德，怎么可能在世上留下美好的名声呢？这种人即使得到了美名，也是虚称而已，也只是“窃名”！他举例说，一个人跨出步子只有咫尺，而人生就好比站在悬崖和拱梁之上，一步之差就可能坠落于深谷或沉溺于急流。为什么呢？因为周围没有回旋的余地。所以他提出，人要经常自责，给自己留有余地，不要追逐于虚假的名声，宁可有实无名，而切忌有名无实。

由“名”与“实”的问题，他特别论述了“讳名”的现象：

凡避讳者，皆须得其同训以代换之：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称；厉王名长，琴有修短之目。不闻谓布帛为布皓，呼肾肠为肾修也。梁武小名阿练，子孙皆呼练为绢；乃谓销炼物为销绢物，恐乖其义。或有讳云者，呼纷纭为纷烟；有讳桐者，呼梧桐树为白铁树，便似戏笑耳。

今人避讳，更急于古。凡名子者，当为孙地。吾亲识中有讳襄、讳友、讳同、讳清、讳和、讳禹，交疏造次，一座百犯，闻者辛苦，无繇赖焉。^①

人的称名只是人的社会符号，命名符号的意义本来与人本身的命运并没有内在的联系，但是在封建时代里，避讳名号几乎成为一种影响交际的陋习。颜之推对此进行了尖锐的讽刺，指出众多名讳造成了交际的困难，说话的人战战兢兢生怕触犯了对方的名讳，听话人费心猜思，十分辛苦。这实际上也是为虚假之“名”所累而出现的语言传播障碍，结果使人只顾搜索枯肠地去探寻“名”的同训所替代的修饰词，忽视了语言传播在人际交往中需要实现的真实意义。

关于写文章，他指出文章需要修饰，但文义更为重要。他说：

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

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

^① 颜氏家训·风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驎,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放意填坑岸也。

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今世相承,趋本弃末,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宕而忘归,穿凿者补缀而不足。时俗如此,安能独违?但务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誉,改革体裁者,实吾所希。^①

颜之推批评了当时追求功利和自我表现的文风,文人们一事感兴,一句清巧,就自以为是得很,不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学问有高低之分,文章也有巧拙之别,但只要用功积累,精心思考,也能写出好文章。他主张文章的“理致”是第一的,华饰是为“理致”服务的。他打比方说,心肾是身体的枢纽,冠冕是身外之物,两者何为重要,一眼便知。颜之推把文章的思想性比作“心肾”,把文章的修饰比作华丽的“冠冕”,针砭了当时浮华的文风。

二、颜之推的教育传播思想

颜之推在中国传统教育方面,提出许多具有独特见解的观点。其内容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亲情教育原则,二是知识教育原则,三是学习态度和

(一) 亲情教育原则

1. “固须早教”

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书之玉版,藏诸金匮。子生咳提,师保固明孝仁礼义,导习之矣。凡庶纵不能尔,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②

他认为人的智能是先天的,分为上智、中庸和下愚三等,不同智能的人在实施教育时会出现不同的结果。为此,他肯定胎教,主张从母体十月怀胎开始,母亲就应用优美的声音陶冶自己,用礼仪支配自己的言行。在孩子生下

^① 颜氏家训·文章.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② 颜氏家训·教子.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之后,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就要加以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意思是要让他懂得什么该去做,什么不该去做,免得养成了坏习惯再去纠正。

2. “威严有慈”

颜之推认为父母在教育子女时,要做到威严和慈爱相结合,过于严厉,孩子不会敬孝,过于宠爱子女会不听话。他说:

人之爱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怜,有偏宠者,虽欲以厚之,更所以祸之。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恶;但重于诃怒。伤其颜色,不忍楚撻惨其肌肤耳。当以疾病为谕,安得不用汤药针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训者,可愿苛虐于骨肉乎?诚不得已也。

比及数岁,可省笞罚。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撻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是也。俗谚曰:“教妇初来,教儿婴孩。”诚哉斯语!^①他指出,对子女的教育和爱护不能厚此薄彼,偏宠偏爱,其效果常常会适得其反。儿童从小养成了习惯,长大就难以改变了,即使进行鞭撻也无益于教育,既不能确立家长的威严,又容易因心理逆反而形成败坏的品德。

3. 以身作则建立良好家风

颜之推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应建立正常的父子关系,不亲狎,不简慢,亲有分寸,爱要细微。他认为父亲的言传身教很重要,治家好比治国,要有一定的宽猛。

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异宫,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痒痛,悬衾筐枕,此不简之教也。^②

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治家之宽猛,亦犹国焉。^③

① 颜氏家训·教子.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② 颜氏家训·教子.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③ 颜氏家训·治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指出家庭教育中父亲的立威、立身、立教十分重要,要庄严、敬重,不可以轻忽随便、松懈怠慢;否则就会影响亲情教育。

4. 重视环境熏陶

颜之推认为人在幼小时,思想未定型,可塑性很强,周围人的言行举止,对他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所以与儿童接触者的身份、地位或可信度,尤其是亲近的人,起着关键的影响作用。他说:

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阅,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①

一般说,孩子容易接受亲近人或信服的人的规劝。所以在禁止孩子不规范行为时,有时老师和朋友的劝诫还比不上经常与他接触的人的指点;就好比劝止人们的殴斗,即使用伟大的道理也比不上自己的亲人说一句普通的话。这里既指出了环境对人的影响,同时也说明了说服效果与客观因素的关系。

环境对子女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少年。孩子们正处在长知识、长身体的时期,很容易受社会的感染。他说:

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墨子悲于染丝,是之谓矣。君子必慎交游焉。孔子曰:“无友不如己者。”颜、闵之徒,何可世得!但优于我,便足贵之。^②

(二) 知识教育原则

亲情教育的起点在家庭,那么知识教育则既与家庭有关,也与社会环境有关,更与自身的修养有关。他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

1. 勤学

他认为古代的明王圣帝,都需要勤学,何况普通人,无论工、农、商、学都应勤学,以求进步,以免受一生的羞愧和耻辱。他说:

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此事遍于经史,吾亦不能郑重,聊举近世切要,以启寤汝耳。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

^① 颜氏家训·序致.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② 颜氏家训·慕贤.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